



# 評《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漂著船》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纂  
卞鳳奎



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  
—朝鮮使節與漂著船  
松浦章著 / 樂學書局  
9103 / 350 元  
ISBN 9573062992 / 平裝

松浦章教授是明清經濟史的專家，1947年出生於日本奈良縣，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職於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並兼任該校東西學術研究所之研究員，主要研究中日關係史及明清經濟史；特別是航運之相關研究。松浦章教授已在日本出版之專書有《中國の海賊》（東方書店）、《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朋友書店），《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之交流—朝鮮使節與漂著船》（樂學書局）一書，則是首次將學術論著在臺灣出版。在國人對史學研究之焦點與重心均集中在臺灣史之際，本書之出版，無疑是帶給臺灣之史學界，致力於明清史之學者們，一股新的活力。

本書共計約 24 萬餘字，內容可分 3 大部份，第一部分係述說渡海來至北京之朝鮮使節之過程；及其所見到北京的種種實態。作者指出，高麗末期，親明派的李成桂，建立新王朝朝鮮國後，與明朝間樹立宗屬國。之後，兩國的關係持續不斷，朝鮮國定期派遣使節赴明朝，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歷經二百二十餘年。作者亦指出，兩國的關係以微視觀之時，是受到國際關係複雜之微妙之影

響。此時是明朝末期中國東北地方滿洲族進出遼東地域的時期，也是明朝政府之勢力，正處於強弩之末的時候。此時的明朝政府，為能挽回其國家威勢，於是就利用外交手段，企圖強求朝鮮同意，將朝鮮使團朝貢之路線大幅更改，以傳播明朝政府的威望文中並指出，自滿州一族日漸強大後，滿洲族進出於明朝統治下的遼東都司管轄的渤海沿海地區，朝鮮國以往明朝朝貢之路，進入滿洲族所管轄之下，朝鮮使節非經陸路，必需一部分是經由海上赴北京。經由遼東轉回的陸路，走訪北京之朝鮮使節，因不得使用海路，故比昔日更為艱辛，亦可發現有遭遇海難之朝鮮使節。作者指稱，朝鮮使節在南宋時代高麗的中國朝貢以前，均是走海陸至中國朝貢，惟因朝貢使節時有遭遇海難，無法順利達成朝貢之任務，再者，每遇海難，必危害到使節之生命等原因，自明永樂七年（西元 1409）開使始，基於上述之理由，再度使用海路至中國朝貢。

對此，該書對明朝末期時，朝鮮使節如何取得朝貢路赴北京，另外將所見到滿洲族之動靜和在北京所看到的狀況等，均作出詳實的敘述。朝鮮使節等一行，沿海路歸國，但卻遭遇海難。他們取海路的原因，關於航路作者引用昔日之史料，在該書中作以下之敘述：時遼路遽斷，赴京使臣創開水路，仍未諳海事，行至鐵山嘴，例多敗沒。使臣康旻、書狀官鄭應斗等亦相繼溺死。自是人皆規避、多行賂得免者云。作者明確的指出，由於遼東經路斷絕，朝鮮使節於是取海路。該路程是由遼東半島先端，通過鐵山嘴航



路，即由山東半島沿遼東半島沿岸之海上路。對朝鮮使節而言，為首次使用船舶，並遭遇海難，朝鮮使節康昱等人遭溺斃。是以朝鮮貢使對來華朝貢均視為畏途。

既然有如上所述的危險，在明朝政府中是何人所提議變更朝貢之路線。作者明確指出，提出此議見者為袁崇煥。袁崇煥約是生於萬曆二十八（1600）年左右。但是袁崇煥當時以弱冠二十餘歲之年齡，思慮卻已極深，果斷極為迅速，袁崇煥為對抗後金軍的攻勢，充分的整頓軍隊，並準備火砲等軍備。是以後金軍欲突破袁崇煥之軍陣極為困難，從朝鮮方面，袁崇煥作為遼東防備的旗主，獲極高的評價。

但隨著後金國勢日益壯大，明朝國勢相對衰落，袁崇煥自被滿州族威脅以來，朝鮮使節就不再相互往來，明朝的威信跌入谷底，袁崇煥內心甚是遺憾。明朝的威信再度回復，對袁崇煥而言，是寧遠地區對滿族樹立了強固的防備體制，由是之故，想必是再度讓朝鮮使節往來的原因吧。如上所述，此係依在寧遠的袁崇煥的意見，對朝鮮使節赴北京的朝貢路作了重大變更。相信此是袁崇煥企圖誇耀確保遼東之意。

雖然朝鮮政府曾向明朝政府表示，因朝鮮船出航的不方便，以及海上多險等原因，提議仍改由陸路至北京朝貢，但未被允許。由於袁崇煥的建議，朝鮮使節再度經過寧遠，這對朝鮮使節而言，進入北京朝貢是極為艱辛的工作。但對袁崇煥而言含有所謂「再度見到漢官的威儀」這種重要的意義。

但是，經歷這樣困難到達北京的朝鮮使節，所看到的中國社會，並不是長年所見的社會。如上述歷經困難重重到達中國的朝鮮使節所見之北京，是明朝腐敗的政局。作者指出，明朝末期的朝鮮使節，將明朝政局的腐敗和新勢力抬頭之滿州族的動向，冷靜注視並把他記錄下來。特別是在官場上，不僅是魏忠賢等宦官一派掌握權力，官吏間的拜金主義更是橫行，呈現腐敗現象。

關於此，明朝最後一位朝鮮使節金堉歸國後，立即向朝鮮政府陳述，以明朝貪瀆之程度來看，能夠存在的時日不多。正如金堉所推測，僅7年的時間明朝就滅亡了。但是，朝鮮使節多數人學習到漢學並成為高度教養之人。他們以其銳利的洞察力所記錄下的文獻，是在明朝方面所不能看到的重要記錄，作者所敘述者，可說是他們確實預見到明朝末期中國社會之變貌。

第二部分則是敘述明代朝鮮船因遭遇海難而漂流至中國之問題。作者指稱，自明朝初期開始，因鎮壓倭寇之必要上，而實施「海禁」政策，中國人私自向海外航渡，以及海外私人性質的渡航至中國等均受到禁止。另外，利用海上之航渡，至中國朝貢之外國使節所乘之船舶則被允許入港。但是，像這樣的定期朝貢關係，卻仍有其他方面的對外關係，其中之一的例外，就是遭遇到海難之船舶漂流至中國之案例。

中國擁有極寬廣的沿海海岸，是以不拘於中國上述政策之限制，亞洲各國之船舶在遭遇海難時多漂流至中國。特別是，緊臨中國旁之朝鮮國，每年例行派遣朝貢使節來至中國，惟並非是因外交使節之派遣關係，而是因在朝鮮國之沿海所航行之船舶及從事之海上活動等船舶遭遇到海難，因而漂流至中國沿海地區。雖然清代之法令有所限制，中國之船舶漂流到朝鮮的案例相當多。但是，關於明代之外國船舶漂流至中國事件的相關研究卻不多。

文中亦指出，關於在明代漂流到中國之朝鮮人、船舶，最為人知者是崔溥所著之《漂海錄》，被評論是極具參考價值。關於此資料，引用進行研究者相當多。但是，朝鮮人、船舶漂流至中國，崔溥所著之《漂海錄》，則並非僅是舉例而已。在明代，漂流至中國之朝鮮船、朝鮮船的事例，可確認的有二十餘例，但其中，關於漂流方面之詳細之敘述；即漂流至中國後，從漂著地開始至歸途上，將江南之農業技術見聞，傳授給朝



鮮，作者認為，除崔溥所著之《漂海錄》外，其他則極少見到。

再者，從該書中可知朝鮮沿海漁民漂著至中國之事情，以及朝鮮沿海漁民之漁業活動之一端。例如文中舉出在全羅道南原府濟州康津縣女性亦操船隨男性從事漁業活動。上述漁民在出海之際，如何準備食糧等，可說是非常稀少的資料。

更且，書中並敘述漁船在漂流中國之際，適逢萬曆壬辰、丁酉倭寇之亂，派遣援軍至朝鮮之中國軍，隨著中國士兵的返回中國，而寓居中國之朝鮮人和侵略朝鮮半島之豐臣秀吉之軍隊遭逮捕成爲俘獲，而將其送回日本之朝鮮人等之事例相當多。從該「朝鮮漁人」之記事可清楚的看出，有中國軍在返國之際渡航至中國並寓居中國如李大挺這樣的朝鮮人之案例。

第三部分係介紹明史料《朝天錄》的重要性及其價值外。作者指出，該書是一部關於明代中國與朝鮮關係問題的重要史料，但臺灣、日本及中國大陸三地之學者卻很少論及。其內容除記述朝鮮使節遠赴明朝完成使命的情況外，還有其往返行止所經之地，通過談古訪今，耳聞目睹所得的地理遠近，墩台設置，器用物價，風俗習慣等的描述和記載，內容十分豐富，有的甚至可彌補正史之缺。因此，作者花費一月有餘之時間，與中國大陸之明史學會秘書長張德信教授，利用其在日本關西大學擔任歷史訪問學人期間，將朝鮮使節赴明朝之記錄，其中行止不清，文字記錄誤植，地理位置不明，殘缺不全等

處，共同蒐集、討論並研究後，加以更正或注記，使該史料更臻完備。相信其二人努力所得到的成果，必能與臺灣、日本及中國大陸三地之學者，共同分享。

松浦章教授在國際史學界，素以善長於發掘新史料著稱。是以從本書中可看到松浦章教授治學勤奮；特別是對採集第一手文獻史料不遺餘力，學術風範令人敬佩，相信對臺灣地區之專家學者，在研究明末清初時期，中國對朝鮮之涉外關係之議題時，有極大之助益。

此外，作者近年來又投入航運史研究，《清代臺灣海運發展史》一書，即是松浦章教授將自1997年開始投入臺灣史研究後，在短短的5年間，陸續在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各重要學術期刊，發表有關臺灣史之論著多篇，並將其中具代表性之9篇論文所整理而成。分別以臺灣之航運和臺灣之涉外關係二部分爲主題，再從各篇中作深入之分析及探討。內容不但立論精闢，見解宏卓，並使用極多在臺灣不易發掘之第一手史料，極具參考價值。而本書亦充分表現出松浦章教授挖掘史料之積極與治學之勤奮，學術風範實在令人敬佩。相信本書必能帶給臺灣學術界更寬廣之研究視野與嶄新的研究領域。

正值此專書將予付梓刊行之際，除向松浦章教授表示祝賀之意外，更期望松浦章教授能繼續對臺灣史；特別是臺灣航運相關議題，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提供臺灣學術界之參考。